

台灣總統大選對於兩岸關係產生的影響： 選票極大化模式與戰略三角途徑

吳玉山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摘 要

本文運用選票極大化策略模式與戰略三角理論來分析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大選對於兩岸關係的影響。由於台灣的民意在統獨和安全／經濟的兩條議題軸線上都表現出趨中的傾向，因此各政黨在競逐總統職位時都提出趨中的大陸政策。表現在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與當選人陳水扁的政策立場上，就是選前的「新中間路線」與當選後願意將「一個中國」作為與中國大陸對談的議題。類似的政治壓力也影響到美國的中國政策。在美國總統大選前後（特別是在選前），理想主義會高漲，而華府的中國政策會向台北傾斜；在兩次的總統大選之間，現實主義會執牛耳，美國的中國政策會向北京傾斜。在中國大陸方面，雖然沒有週期性的選舉，但是國內政治仍然發揮了很大的影響力。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已經無法作為中共政權合法性基礎的情形之下，北京依靠的是民族主義和經濟表現，而此二者在對台灣的政策上有著相互衝突的要求。民族主義要求對台灣施壓、對台獨不惜一戰；而經濟表現要求一個穩定安全、和西方與台灣和平相處的環境。北京的對台政策，會在這兩種壓力和要求之下擺盪。中共的黨代表大會也像民主國家的定期選舉一樣，造成對於在位者權力地位挑戰的時機，也因此促使執政者對台採取較強硬的政策。由於台灣、美國和中國大

陸三方面的國內政治都對於其兩岸政策產生重大影響，因此美國和兩岸之間的相對政策位置距離就不斷變動。根據此種分析，總統大選雖然由一向主張台灣獨立的民進黨獲勝，但是對於兩岸關係的衝擊卻有限。而當三方的國內政治條件都改變之後，對台北的安全威脅才會增加。

壹、前言

欲探討中華民國第十任的總統大選對於兩岸關係的影響，可以有兩個途徑。一個是將選前與選後台灣有關選舉的資料和兩岸關係的互動放置在一起，然後加以對照，試圖找出其間的關聯性。其內容是以敘述和個別的狀況分析為主。另外一個方式則是用理論的途徑，將台灣的總統選舉視為台灣內部政治情勢的轉變，然後透過國內政治影響對外關係的理論架構，來看台灣總統大選對於兩岸關係的影響。這兩種途徑第一個是非理論性的，第二個則是理論性的。¹關於非理論性的論述在坊間已經很多，同時由於缺乏理論的指引，因此較不深入。²本文則是試圖用兩岸關係研究當中的國內政治理論和戰略三角理論來推論台灣總統大選對於兩岸關係的影響。其目的除了解析此一當前的重大政治議題外，更在於發展和驗證兩岸關係研究當中的理論途徑。

在目前國內的文獻當中，關於兩岸關係大致已經發展出三大面向、十個途徑。³這三個面向是兩岸互動、國內政治和國際環境。兩岸互動面向直接觀照台灣和中國大陸相對應的模式，這其中包括了分裂國家模式⁴、整合理論⁵、權力不對等（大小政治實體）途徑⁶和博奕理

1. 關於兩岸關係研究中的理論和非理論性論述，請見吳玉山，*抗衡或扞從：兩岸關係新詮－從前蘇聯看台灣與大陸間的關係*（台北：正中，1997年），第一章。

2. 例如文畢真，「徘徊在戰爭與和平的十字路口——台灣選舉後兩岸關係展望」，*中國評論*，2000年4月號，頁5-8。

論等。⁷國內政治面向是將兩岸關係看成雙方國內政治的函數，主張到台灣和中國大陸各自的內部政治環境中去尋找解釋兩岸關係的因素。在這裡有選票極大化模式⁸、國家與社會典範⁹和政治心理學途徑等。¹⁰最後，國際環境的面向是將兩岸關係放置在國際的格局中來理解。這其中包含了戰略三角理論¹¹，國際體系途徑¹²與認知模式。¹³這些理論、模式和途徑採取了不同的角度來詮釋兩岸關係，並且各自具有其優點和缺失。¹⁴

-
3. 關於兩岸關係研究的方法論探討和文獻分析，請見 Tun-jen Cheng, Chi Huang, and Samuel S.G.Wu, eds., *Inherited Rivalry* (Boulder, Colorado: Lynne Rienner, 1995)；與包宗和、吳玉山主編，*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台北：五南，1999年）。
 4. 請見 Gregory Henderson, Richard Ned Lebow, and John G. Stoessinger, eds., *Divided Nations in a Divided World* (New York: David McKay, 1974)。
 5. 吳新興，*整合理論與兩岸關係之研究*（台北：五南，1995年）。
 6. 吳玉山，*抗衡或扞從：兩岸關係新詮*（台北：正中，1997年）。
 7. 例如包宗和，*台海兩岸互動的理論與政策面向：1950-1989*（台北：三民，1990年）。
 8. 吳玉山，「台灣的大陸政策：結構與理性」，載於包宗和、吳玉山主編，*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
 9. 冷則剛，「大陸經貿政策的根源：國家與社會的互動」，載於包宗和、吳玉山主編，*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
 10. 石之瑜，「芝麻！開門 心理分析引領兩岸政策研究進入新境界」，載於包宗和、吳玉山主編，*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
 11. 包宗和，「戰略三角角色轉變與類型變化分析－以美國和台海兩岸三角互動為例」，載於包宗和、吳玉山主編，*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
 12. Yu-shan Wu, "The Collapse of the Bipolar System and Mainland China's Foreign Policy," *Issues and Studies*, Vol.29, No.7, July 1993, pp.1-25.
 13. 袁易，「安全典制與美『中』關係：一個認知社群論的分析架構」，載於包宗和、吳玉山主編，*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

在這許多的途徑當中，適合分析台灣選舉的結果對於兩岸關係影響的是國內政治面向和戰略三角理論。前者是由於台灣的政權轉移是一個國內政治變遷的因素，因此適合用國內面向的理論來討論對於兩岸關係的影響。後者則是由於美國在兩岸之間扮演著「非自願樞紐」的角色，舉足輕重，因此台灣的總統大選是和美國的角色直接聯繫在一起，共同對於兩岸關係產生作用。在以下的討論當中，我們將先評述這兩個研究途徑，然後將其適用於台灣總統大選後的兩岸關係。

貳、選票極大化策略模式及其延伸

在詮釋國內因素對於兩岸關係影響的理論當中，選票極大化策略模式是最適合分析台灣的總統大選的。選票極大化策略模式是從建立議題空間開始。台灣的大陸政策被認為有兩個最主要的面向：一個是統獨爭議（認同面向），一個是經濟與安全的衝突（利益面向）。¹⁵在這兩者當中，統獨爭議得到國內外的矚目，但是經濟和安全的衝突也隨著時局的發展而變得越來越重要。¹⁶特別是台灣各政黨和政治勢力對於中國大陸的政策必須靠這兩個面向所交織而成的政策平面才能夠加以精確地定位。因此在探討台灣大陸政策的時候，對於這兩個面向必

14. 吳玉山，「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載於包宗和、吳玉山主編，*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

15. 請見 Yu-shan Wu, "Moving towards the Center: Taiwan's Public Opinion and Mainland Policy in Shif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kshop on Cross-Strait Relations,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Vancouver, August 21-22, 1998.

16. 例如林繼文、羅致政，「零和或雙贏？兩岸經貿交流新解」，*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10卷，第1期，1998年3月，頁33-77，即採用賽局理論來理解兩岸經濟和安全的關聯議題。另請見 Yu-Shan Wu, "Mainland China's Economic Policy Toward Taiwan: Economic Needs or Unification Scheme," *Issues and Studies*, Vol.30, No.9, September 1994, pp. 29-49。

須一起討論。¹⁷選票極大化策略模式首先為各個重要行為者的大陸政策偏好在議題平面上定位。這些行為者是台灣的各個主要政黨，包括國民黨、民進黨、新黨和建國黨，以及各黨內的主要派系。¹⁸由於這些政黨都必須在選舉中競爭，因此它們的大陸政策就必然會受到勝選考慮的影響。這個共通的因素讓我們可以進一步探究各黨決定其大陸政策的模式。

唐斯(Anthony Downs)在 1957 年提出在選民偏好常態分配的情形下，政黨的政策有向中央峰點移動的傾向，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是政黨希望將其選票極大化。¹⁹明居正便採用了唐斯的理論來討論台灣政黨由於選民偏好趨於中央因而向中間地帶移動的現象。²⁰在大陸政策的領域內，不論是在認同面向，或是在利益面向，選民偏好常態分配的情況都很清楚。

在大陸政策的領域當中，選民的偏好表現出常態分配。大陸政策平面是由「認同」和「利益」兩條軸線所構成的（如圖一）。在認同軸線（x 軸）上，右端是統一，左端是獨立。從右到左的政策立場是盡快統一、維持現狀以後統一、永遠維持現狀、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維持現狀以後獨立與盡快宣佈獨立。²¹在陸委會委託政治大學選舉研究

17.請見李怡，「台灣的兩岸政策『三黨趨一』」，九十年代，第 339 期，1998 年 4 月，頁 35-36。

18.在 2000 年總統大選之後，當然應該加入由宋楚瑜所領導的親民黨。

19.請見 Anthony Downs,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7)。

20.請見明居正，「向心競爭與中華民國政黨政治之發展」，理論與政策，第 12 卷，第 2 期，1998 年 5 月，頁 142-156。

21.究竟「永遠維持現狀」和「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這兩項是哪一項較為偏向統一，哪一項比較偏向獨立，必須要看對於現狀的定位。如果認為現狀是中華民國，而不是台獨，則永遠維持現狀就比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要偏向統一，因為以後再決定包含了有走向台獨的可能。然而如果將現狀視為台灣已

中心、柏克市場研究中心、中華徵信所和中山大學民意調查研究中心所做的跨年度民意調查當中，統獨立場居中（永遠維持現狀和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的民眾恆佔最大的比例。²²很明顯的在統獨認同議題上民眾的意向展現了中間大、兩頭小的常態分配。²³

在大陸政策的平面圖上，我們用y軸代表利益：上端是經濟利益，而下端是安全利益。我們認為主張經濟利益者會認為兩岸交流開放的速度太慢，主張安全利益者會認為兩岸的交流開放速度太快，而主張經濟和安全並重者會認為兩岸交流開放的速度剛剛好。因此民眾對於兩岸交流開放速度的看法就可以作為民眾主張經濟利益為先、安全利益為先、或經濟利益與安全利益並重的指標。在上述陸委會委託的民意調查當中，我們發現認為兩岸交流速度剛好的比例始終最高，民眾同時著重經濟和安全，而不認為可以偏廢。²⁴因此在利益的軸線上我們也可以看出常態分配的情況，也就是認為經濟和安全應該並重的民眾比認為經濟利益為重或安全利益為重的民眾要超過很多。²⁵

經獨立於中國大陸之外，則永遠維持現狀就比以後再決定較為偏向獨立，因為以後再決定包含了和中國大陸統一的可能。

22. 在 1995 年 5 月到 1998 年 5 月之間的 11 次抽樣調查當中，統獨立場居中的比例有 8 次超過 50%。至於主張急統的只有 1.5% 到 5%，主張急獨的也只有 3.4% 到 10%。主張緩統的有 13.9% 到 24.2%，主張緩獨的是 6.7% 到 13%。

23. 請見陳義彥、包宗和、張五岳、洪永泰、高安邦、游清鑫、劉義周、黃德福、吳玉山，「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第四波面訪」，陸委會研究計畫，1999 年。

24. 從 1995 年 2 月到 1998 年 5 月所做的民意調查當中，我們發現認為兩岸交流開放速度剛好的比例始終最高（35.8% 到 55.2%），超過任何一次認為兩岸交流開放速度太慢（12.4% 到 23.5%）或太快（12.5% 到 30.1%）的比例。

25. 請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中華民國台灣地區民眾對兩岸關係的看法（2）」，1998 年 6 月。

圖一 總統大選前大陸政策平面上的各黨位置

由於民眾在認同和利益的軸線上都以居中間立場者為最多，因此站在爭取最多選票的立場，各黨便有向原點（兩條軸線的中位）趨近的結構性壓力，也就是原來處於第一象限的政黨有向下或／且向左移動的壓力，原來處於第二象限的政黨有向下或／且向右移動的壓力，原來處於第三象限的政黨有向上或／且向右移動的壓力，而原來處於第四象限的政黨有向上或／且向左移動的壓力。具體的來說，兩位蔣總統時期的老國民黨是堅持統一和強調國防安全。李登輝總統領導下的新國民黨一方面在統獨立場上向中間靠攏，而在經濟和安全的議題上一方面將投資與間接貿易合法化，一方面則以「戒急用忍」來加以限制，整體而言仍然是以國防安全為優先。民進黨先是趨近台獨的一極，並且以安全為唯一考慮，而後因為前主席施明德與許信良的「大和解」和「大膽西進」而向中間靠攏，不但拋棄了急獨的主張，在事實上承認中華民國，更有美麗島系倡言以中國大陸為台灣「新興民族」的發展腹地。至於新黨，一方面和老國民黨一樣主張統一，一方面卻又在經濟的議題上力主和中國大陸加強交往。後來有姚立明等主張「一中兩國」，這就是在統獨議題上向中間地位移動。總之，在總統大選的競選活動展開之前，三黨已經表現了向中間地帶移動的現象。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就是選舉的壓力。台灣的選民在統獨議題上的立場大多數趨近中央，也就是不統不獨、先維持現狀，將來再說。在經濟和國防安全上大多數人也認為兩者都重要，不能只考慮其中之一。結果三黨都感受到這種選民的偏好，而不由自主的把自己的大陸政策向中間地帶調整。

在圖一中我們看到舊國民黨處於第四象限，因此會向左移動（台灣優先），同時感受到向上移動的壓力。民進黨處於第三象限，因此會向右（大和解）向上（各種西進說）移動。新黨位於第一象限，因此有向左移動的壓力（一中兩國），同時也受到各黨的批評，要求其更考慮國家安全（向下移動）。不過由於新黨是新興政黨，所以改變路線的空間較小。建國黨最新最小，還完全停留在道德訴求和意識形

態的階段，因此更不會改變。不過總體而言，民主政治和民意的常態分配對於各主要政黨都產生了趨同的壓力。各黨的共同壓力趨向是認同和利益的中間地帶。²⁶

總統選舉更是如此。由於是全國一選區，因此各候選人如果要當選就必須掌握多數民意。於是民進黨先是在 1999 年 5 月通過了「台灣前途決議文」，勉強在文字上承認了中華民國。接著陳水扁又在 11 月提出「中國政策白皮書」對戒急用忍加以批評，並提出「單向定點直航，雙方營利共享」與「先海後空、先貨後人」的修正性主張。「台灣前途決議文」是在統獨議題上向中間靠攏，而「中國政策白皮書」則是在經濟／國防安全的議題上向中間靠攏。在國民黨方面，雖然在戒急用忍的政策上沒有改變，但是由李總統於 7 月所拋出、由連戰所背書的「兩國論」在實質上就是將國民黨的統獨定位由長期以來的「維持現狀、將來統一」推向「維持現狀、將來未定」，也就是繼續往中間靠攏。到了選戰後期，連戰的「連十條」更把對於中國大陸的接觸可能大幅度放寬，表明只要北京有善意，就可以進入國統綱領的「中程階段」。至於獨立候選人宋楚瑜雖然批評兩國論的決策過程，但是在內容和實質上並沒有加以反對，反而提出了自己「比李登輝還李登輝」的說法（所謂「準國際關係」）。宋在三通等議題上也不以戒急用忍為然，主張有所放寬，只是他由於擔心受到省籍問題的困擾，因此不敢大作文章。總之，不論在統獨或經濟／安全的議題上，三位候選人都在把自己定位在中間地帶，彼此的差異不大。大家都主張某一種形式的兩國論，大家也都注重經濟與安全。²⁷ 整體看來，統獨和經濟

26. 請見 Yu-Shan Wu, "Taiwanese Elections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Mainland Policy in Flux," *Asian Survey*, Vol.39, No.4, July/August 1999, pp.565-587。

27. 吳玉山，「大陸政策，向中看齊」，*聯合報*，台北，民意論壇，1999 年 11 月 5 日，版 15。

圖二 各總統候選人的大陸政策

與安全的兩條軸線相交的原點代表了民意的歸趨，是認同與利益兩條常態分配曲線的峰點重合之處，因而對於各個政黨產生了強大的吸引力。

選舉的結果是由民進黨的候選人陳水扁以 39.3% 的得票率當選。其原因最重要的就是泛國民黨陣營力量的兩分，連戰與宋楚瑜爭奪同質性很強的選票，使得陳水扁當選。在選戰過程當中，興票案將宋楚瑜領先的局面破除，一時拉近了連宋間的差距，使得棄保效應在選戰的絕大部份時間無法產生。²⁸到了最後，雖然泛國民黨的選票集中流向宋楚瑜，但是連戰的崩潰不夠徹底，於是宋楚瑜以 36.8% 高票落選。²⁹除了三人賽局的結構性因素之外，對陳水扁當選幫助最大的就是所謂的「新中間路線」。這個路線在選戰的末期獲得了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的背書，從而對於中間選票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新中間路線」的意義就是在於沖淡陳水扁的台獨色彩，表現在大陸政策上就是向統獨和安全／經濟兩個議題的中點趨近。即使在選前三天，當中共總理朱鎔基對台灣選民施行恫嚇時，民進黨的正式反應也是較為謹慎和低調的。³⁰這是表示民進黨為了贏得選舉，努力塑造自己在兩岸問題上是和大多數主流民意一樣，採取了中間的位置。而此一策略，確實對於緩和選民疑慮產生了很大的作用。這正是選票極大化策略模式所預測

28.關於棄保效應，請見吳玉山，「明年總統大選，棄誰保誰」，**中國時報**，台北，時論廣場，1999 年 9 月 6 日，版 15。

29.吳玉山，「分裂的國民黨，送扁進總統府」，**中國時報**，台北，時論廣場，2000 年 3 月 19 日，版 15。

30.在朱鎔基發表談話之後，邱義仁代表民進黨做出反應，仍然表示願意和北京理性對話。不過陳水扁在屏東和高雄鳳山的演講會中，則提出較激烈的反應，他認為只有台灣人民有權利選自己的領導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資格幫忙選。台灣未來的領導者，有義務、使命捍衛台灣主權，不能成為香港、澳門第二。他要維持台灣主權永遠確保，不要讓台灣成為中國的一部份。請見**聯合報**，台北，2000 年 3 月 16 日，版 3。

的。

陳水扁雖然依靠「新中間路線」當選，但是他的得票率還不及全部選票的四成。再加上立法院中民進黨只有三分之一的席次，北京和華盛頓又密切關注台灣選後的政局，並且直接間接的施壓，因此陳水扁在當選後步步為營。他選擇蕭萬長內閣的國防部長唐飛為閣揆就反映出對於上述國內、外約制的體認。就是在此種狀況之下，選前的「新中間路線」獲得持續。陳水扁仍然繼續往中間靠攏，使得他的政策與國民黨左翼（本土派）幾乎無所分別。在原先的選票極大化策略模式當中，各個政黨和政治勢力所採取的政策位置是為了獲取最多的選票。在選後的台灣，總統當選人由於體認到自己是少數總統以及國內、外的約束，因此會努力求取能將政治支持極大化的政策位置。從新內閣組成的過程和人事佈局，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這個路線的軌跡。在新政府的組成上，民進黨各派系所能分得的職位有限。外交部長和陸委會主委等重要職位由國民黨左翼人士出任。為了緩和兩岸關係並且安定對美關係，在閣揆、國防部長、駐美代表等方面是由傳統的國民黨右翼掌握，甚至對於親民黨都爭取特定人士入閣。用最涵括性的方式組閣，以爭取陳水扁的第一任政府順利產生，這就是「全民政府」的實質意涵。³¹

因此不論選票極大化策略模式或是政治支持極大化策略模式，都驅使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和當選人的陳水扁向中間移動。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台灣趨中的主流民意確實已經馴服了各個主要政治勢力，迫使任何執政者都只能在一定的範圍內移動。³²

31. 陳水扁雖然體認到國會中民進黨是少數黨，但是由於國民黨的多數並不堅實，黨內派系林立，因此並不願意像法國第五共和一樣實行兩黨共治，甚至也不願和國民黨組成聯合內閣，而是以個別方式延攬國民黨人士參與其內閣，從而化解將來國會對於政府的杯葛。這是希望以最小讓步獲得最大政治利益的策略，也是求取短期安定的做法。

參、不情願的樞紐：隨選舉週期擺盪的美國對華政策

在理解了台灣本身對於新政府的制約之後，為了要分析現階段的兩岸關係，我們必須將台灣、美國和中共納入戰略三角(strategic triangle)的框架中來討論。在台灣－美國－中共的三角關係當中，美國是扮演「樞紐」(pivot)的角色，而台灣和中共則是「側翼」(wings)。樞紐的角色是存在於「羅曼蒂克型」的戰略三角(romantic triangle)當中。所謂「羅曼蒂克型」的三角是指在三邊關係當中有一邊為負（敵對），兩邊為正（親善）。敵對關係是發生在兩翼之間，而兩個親善關係是發生在兩個側翼和樞紐之間。從理論上來說，另外還有三種戰略三角。「三邊家族型」(menage a trois)是指三邊關係均為正。「婚姻型」(marriage)是指兩邊為負，一邊為正。「單邊否決型」(unit veto)是指三邊關係都是敵對的。³³在四種戰略三角的形態當中，一共產生了六種角色。它們分別是羅曼蒂克型中的樞紐和側翼，三邊家族型中的「朋友」，單邊否決型中的「敵人」，和婚姻型中的「孤雛」(outcast)和「夥伴」(partner)。³⁴樞紐普遍被認為是在戰略三角當中最為有利的角色。這個看法不僅是學術界的共識，更是美國的戰略家構思國家戰略時的假設。在1960年代末，美國由於長期介入越戰，國力大為損

32.當然一旦新政權將其權力鞏固，其可能左右移動的範圍會加大。

33.這四種三角關係是由羅德明(Lowell Dittmer)發展出來的。請見 Lowell Dittmer, "The Strategic Triangle: A Critical Review," in Ilpyong J. Kim, ed., *The Strategic Triangle: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Paragon House Publisher, 1987), p.34；與 Lowell Dittmer, "The Strategic Triangle: An Elementary Game-Theoretical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Vol.33, No.4, July 1981, pp.485-516。

34.這六種角色是取自 Yu-shan Wu, "Exploring Dual Triangles: The Development of Taipei-Washington-Beijing Relations," *Issues and Studies*, Vol.32, No.10, October 1996, pp.26-52。

耗，無法獨立圍堵國際共產主義的擴張。於是季辛吉為尼克森獻策，提出新五強－美國、蘇聯、中共、西歐與日本－的構想，一方面想要敦促盟國西歐和日本分擔防衛重擔，一方面將北京拉入大戰略三角的格局中來，力圖使得華盛頓取得其中樞紐的地位。於是美國相繼和蘇聯與中共改善關係，同時又利用北京與莫斯科之間的敵對來增進本身的利益。³⁵

由於在學術界和外交界對於樞紐的優越性都有一致的看法，因此很少有人對於此一觀念加以挑戰。這個狀況一直到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後都沒有改變。當華盛頓－台北－北京的三邊互動關係逐漸展開，並且成為後冷戰時期國際結構當中重要的一部份之後，研究者很自然便會想要採用戰略三角的架構來分析美國、中共和台灣的互動。此時核心的問題便是華盛頓－台北－北京的三角關係究竟是屬於哪一種類型？由於台灣和中共都全力經營和美國的關係，希望在兩岸關係當中獲得美國的支持，而兩岸彼此之間又無法免除劍拔弩張的態勢，因此毫無疑義的，當前的美國－台灣－中共關係是羅曼蒂克型的戰略三角。在這個三角當中，華盛頓是扮演著樞紐的角色，和北京與台北基本上都維持著親善的關係，而台灣與中國大陸則是扮演著兩翼的角色，相互爭奪美國的青睞。美國的地位依戰略三角的觀點來看是最為優越的，而台北和北京則是處於相當不利的地位。³⁶

以上的推論雖然引導我們認定美國是處於最有利的樞紐地位，但是從實際的狀況來看，美國在兩岸間扮演樞紐的角色是非自願的。華盛頓並沒有在兩岸之間利用「傾斜」的策略來獲取利益，反而苦於兩岸各自動員本身在美國的支持者來影響華盛頓的對華政策。美國政策

35.關於季辛吉為美國求取樞紐地位的策略，請見 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36.羅致政，「美國在台海兩岸互動所扮演的角色－結構平衡者」，*美歐月刊*，第10卷，第1期，1995年1月，頁37-54。

的搖擺不是出於季辛吉式的謀略，而是反映了行政當局在不同時間受到親台北和親北京勢力的影響，從而做出了被動的反應。因此美國所扮演的角色是「非自願的樞紐」(unintending pivot)，不但沒有獲得樞紐地位所應該帶來的戰略利益，反而苦於兩岸所施加的交叉壓力。這種形態的樞紐完全不是季辛吉在 1970 年代時所擬想的。

究竟是什麼機制決定了一個非自願樞紐的傾斜政策(tilting policy)？如果一個樞紐是自願的，那麼它的菁英顯然會有意識的利用本身在一個羅曼蒂克三角當中的地位來爭取最大的利益。傾斜的意義就在於用傾向一翼的動作來造成另一翼的不安，從而使得另一翼採取追求樞紐的行為。因此傾斜是策略性的、一時的以及可逆的。然而對於一個非自願的樞紐而言，雖然有意與兩翼都保持友善關係，但是並無意見到兩翼間的緊張，也不會利用此種緊張關係來謀取本身的利益。如果一個非自願的樞紐對一翼採取了傾斜的政策，則其原因並不在於操縱另一翼的行為，而是由於本身和兩翼的直接關係。這樣看來，自願樞紐與非自願樞紐的傾斜政策有完全不一樣的原因和目的。

美國的外交政策當中一直有非常強的理想主義色彩。這個特質最清楚的表現在威爾遜總統(Woodrow Wilson)的「十四點原則」(Fourteen Points)和他對於國聯的倡議當中。此種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一直都在美國的外交政策當中爭奪主導地位。³⁷美國的外交政策當中理想主義特別強烈的原因是由於美國當初以理想主義立國，並標榜道德原則以與舊世界區別。後來又由於美國得天獨厚的有兩洋的保障，因此可以奉行理想主義而不至於滅亡。³⁸到了二十世紀，美國以豐沛的國力、超級

37.關於美國外交政策當中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的爭論，請見 E. H.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New York: Harper & Row, 1946)與 David A.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38.同註 35，第一章。

強國的姿態踏上世界舞台。它無比的權力使其得以在國際政治中實踐道德信念，而能承受由此帶來的現實利益損失。這是其他國家所不可想像的奢侈。因此理想主義在美國的外交政策當中特別活躍，而為他國所不及。

在美國的外交政策當中對中國（包括中國大陸和台灣）的政策是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對比最為強烈之處。站在理想主義的立場，中共是共黨專制政權，是美國所崇尚的一切價值的反面。在另一方面，現實主義要求美國為了本身的戰略和經濟利益而尊重中共的權力，承認中國大陸是東方新興的強權。³⁹一般而言，當理想主義興盛的時候，華盛頓對於中共會採取較嚴厲的態度，其中國政策也會反映出此種基本立場。由於台灣在制度上是中國大陸的對立面，又長期受到中共的武力威脅，更是美國的忠實扈從者，因此對大陸的嚴厲很自然就會轉化成對於台灣的同情與支持。然而當現實主義當道的時候，華盛頓會用季辛吉式的眼光來看世界，而將人權與民主置於腦後。在這種狀況之下，中國大陸的重要性自然變得非常顯著，而其內政也被認為與美國的利益無涉。至於台灣則會被現實主義者視為阻礙美國和中共建立穩定合作關係的障礙。此時華盛頓的中國政策明顯會傾向北京。

美國的對華政策在台北和北京之間的擺盪是繫於美國國內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的權力對比。然而究竟是什麼決定了此一權力對比呢？從過去二十年的經驗來看，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消長是和美國的選舉週期密切相關的。每當總統大選接近時，理想主義就會高漲，而現政府中國政策中的現實主義就會成為國會和輿論抨擊的對象。為了應付此種批評，執政黨就會採取若干符合理想主義者期望的政策，而這通常就是指對北京強硬、而對台北友善，也就是向台北方面傾斜。總統大選的結果，有可能現任者連任成功或執政黨的候選人競選成功，

39.關於中國大陸在國際社會的興起，請見閻學通等著，**中國崛起：國際環境評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

如此則美國政府的中國政策不至於有大幅度的更動。選前對於理想主義者的讓步也會在選後逐漸取消。如果是挑戰者成功，發生朝野政黨更替的現象，則新總統主張理想主義的期間可能會較長一些，但是現實主義的壓力很快就會出現。新政府必須和北京交往，也必須滿足美國的戰略和經濟利益。所以不論是誰贏得了總統大選，在選後都會出現華府的中國政策向北京方向傾斜的現象。綜合而言，在美國總統大選前後（特別是在選前），理想主義會高漲，而華府的中國政策會向台北傾斜；而在兩次的總統大選之間，特別是上一次選舉已經結束一段時間、而下一次選舉還要很久才會到來的時候，現實主義會執牛耳，而美國的中國政策會向北京傾斜。造成此種現象的原因是選舉迫使政治人物注重選民的外交政策偏好，而此種偏好向來是傾向於理想主義，也就是傾向台灣。在選間期（兩次選舉之間）執政者比較不受到選舉的壓力，會較為注重國際政治的因素，這就表示政府的中國政策當中現實主義會抬頭，於是華府會向北京傾斜。

我們可以很輕易的將此種現象加以證實。當卡特總統(President James E. Carter)在 1979 年拋棄台北而承認北京的時候，他受到共和黨人劇烈的抨擊。在 1980 年的總統大選期間，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雷根攻擊卡特出賣台灣，主張一旦當選他要重新承認中華民國。當雷根擊敗卡特當選後，華盛頓和北京的關係一度交惡，然而由於美蘇兩個超級強國當時正處於激烈競爭的時期，波蘭危機又深深刺激著華府，因此雷根很快的修正了他的親台北主張，而在 1982 年和中共簽訂了八一七公報，在對台軍售上設定限制。到了 1984 年強烈反共的雷根甚至訪問了中國大陸，並且對於中共改良式的共產主義大加讚賞。⁴⁰由於雷根和他的副總統布希(George W. Bush)連續贏得了 1984 和 1988 年的總統

40.請見吳玉山，「兩極體系的崩解與中共的外交政策」，載於江振昌主編，*國際新秩序的探索與中共*（台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93），頁 160。

選舉，共和黨長期執政，因此美國的中國政策在整個 1980 年代改變不大。在 1989 年所發生的天安門事件雖然引起國際矚目，但是布希從一開始就主張持續與中共交往，⁴¹甚至在六四後很快就派遣特使到北京，向中共的領導人鄧小平表示美國和中共的關係將不會改變。⁴²只有當下一次總統選舉在 1992 年如火如荼的展開的時候，共和黨的中國政策才受到真正嚴重的挑戰。當時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克林頓(William J. Clinton)高舉人權和民主的大纛，大肆抨擊布希「向天安門的屠夫磕頭」。⁴³而布希也在 1992 年 9 月初決定售予台灣 150 架 F-16 戰機，這是前所未有的親台北動作。⁴⁴

克林頓贏得了 1992 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一時間華府和北京的關係充滿了緊張。但是國際政治的考慮很快就影響到新政府的外交決策，其情況和 1981 年後雷根政府由理想主義轉向現實主義如出一轍。在 1994 年克林頓決定將人權和中國大陸的最惠國待遇脫鉤(delink)，就是此一現實主義思維的反映。可是到了 1995 年，由於受到國會中批評者的強大壓力以及為了在選前展示克林頓政府的原則與立場，美國發給李登輝總統簽證，讓他以私人名義訪問母校康乃爾大學，並且發表演說。接下來的演變大出華府的預料之外。北京不但做盡了外交上的抗議動作，並且不惜在台灣海峽操兵，甚至對台灣展開了導彈試射。這些軍事威嚇在中華民國第一次總統直選的時候發生，迫使以全球民主

41. 關於布希的中國政策，請見 Strobe Talbott, "Post-Victory Blues," *Foreign Affairs*, Vol.71, No.1, 1991/1992, p.69。

42. Alan Tonelson, "Prudence or Inertia? The Bush Administration's Foreign Policy," *Current History*, Vol.90, No.558, 1991, pp.311-316.

43.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November 19 1992, p.16.

44. 當然布希此一決定的直接目的是為了討好美國的勞工，以增加勝選的機會，但是這個動作一方面也取悅了強烈反對中共的人士，同時反映出在選舉時期國內因素的重要性超越了國際因素。請見吳玉山，「兩極體系的崩解與中共的外交政策」，頁 164。

和人權為己任的美國政府做出相對應的動作。於是台海風雲緊急，美國和中國大陸隱然要為了台灣而走向戰爭。

然而華盛頓和北京的緊張關係到了 1996 年克林頓贏得總統選舉後就煙消雲散。華府又一次向北京靠攏，這一次更有防止戰爭發生的強烈動機。在 1997 和 1998 年，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和克林頓交換了國事訪問，並且建立了華盛頓和北京的戰略夥伴關係。⁴⁵克林頓甚至在上海響應中共的要求而提出了「新三不」。⁴⁶很明顯的，在選間期美國的中國政策向北京傾斜，而台北則承受了非常大的壓力。這是 1981 年和 1993 年情況的重現。然而不旋踵 2000 年的美國總統選舉開始逐漸接近，克林頓現實主義的中國政策開始受到很大的挑戰，美國和中共之間又產生了新的緊張關係。這就好像是 1995 年的翻版。從 1998 年年底開始，華府與北京的關係從戰略夥伴關係的高峰重新跌入谷底。先是有中共對於民主人士的鎮壓，接下來是 1999 年年初美國國會對於行政部門洩漏飛彈科技給中國大陸展開追究，最後產生了考克斯報告。緊接其後的是有關於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的發展與部署，尤其是美國不排除邀請台灣參加。在 4 月的時候朱鎔基訪美，為了排除中國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障礙而提出了巨大的讓步，但是此種善意的表示並沒有扭轉華府和北京關係惡化的趨勢。⁴⁷其後中共鎮壓法輪功事件讓美國輿論產生了極大的反感。到了 5 月北約對於塞爾維亞的轟炸摧毀了中共駐貝爾格勒的大使館，而大陸的民眾也攻擊了美國在北京的使

45.關於北京對於此一發展的看法，請見蘇格，「世紀末國際形勢展望：國際格局與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中國評論*，第 14 期，1999 年 2 月，頁 8-10。

46.關於對於台灣的影響，請見熊玠，「二十一世紀中國統一前景預測」，*中國評論*，第 14 期，1999 年 2 月，頁 60-64。

47.朱鎔基知道他在此種狀況之下訪美會遇到很大的困難，但是他仍然願意去給美國人「消消氣」。請見"An Interview With China's Zhu Rongji,"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6, 1999, p.A23；*聯合報*，台北，1999 年 4 月 6 日，版 2。

館，雙方關係瀕臨決裂。在7月李總統「特殊國與國關係」理論的提出把華盛頓和北京的關係推到危險邊緣，後來美國緊急做了大動作來緩和雙方的敵對姿態，而北京也較為自制。不過美國國會還是繼續研議「台灣安全加強法」(Taiwan Security Enhancement Act)，同時 TMD 的計畫也持續進行。在總統大選持續接近的情況下，美國對於台灣的關切與日俱增。即使許多國會菁英反感李總統「兩國論」的提出，但是不論行政和立法部門都表示反對中國大陸在台灣海峽採取任何軍事動作。這樣的發展完全符合我們對於華盛頓中國政策隨選舉週期而擺盪的理解和預測。從此一角度來看，美國的政治人物和台灣的政治人物一樣，在選舉時期會較大的受到國內政治因素的影響，而主張對於本身政治地位較有利的對外政策。不過這個命題也蘊含著一旦選舉過後，政治領導人的考量就取得了較大的相對自主性，而不會受到國會、反對黨和民意太大的掣肘。由於行政部門在涉外事務方面一般而言都比在內政事務方面擁有較大的權力，因此當脫離了選舉的壓力之後，政治領導人本身的偏好和其他非國內政治因素的考量就會較強的顯示在對外政策上。不論是台灣或美國都顯現出此種現象。

肆、各方在兩岸定位立場上的轉變與兩岸關係的前景

由以上的討論當中，我們瞭解到台灣和美國如何受到國內政治的影響而改變它們的兩岸政策定位。中國大陸的對台政策事實上也受到國內政治的重大影響。在圖三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國民黨、民進黨、中共和美國對於兩岸定位立場的轉變。國民黨由最初的一個中華民國、光復大陸轉變成 1991 年的「國家統一綱領」與 1992 年的「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兩岸共識，形式上是與中國大陸的立場靠近(KMT1)。然而從 1993 年以後，在李登輝總統主政下，國民黨的兩岸定位逐漸左移，透過務實外交、元首出訪（包括李總統在 1995 年的美國康乃爾母校之行）等動作，台灣努力在國際社會當中求取雙重承認，最後出現了 1999 年的「特殊國與國關係」理論，實際上就是拋棄

了國民黨長期以來所堅持的「一個中國」原則(KMT2)。⁴⁸在民進黨的方面，由主張台灣獨立建國的「台獨黨綱」，經過許信良和施明德等人的修正，最後終於在 1999 年的「台灣前途決議文」當中承認台灣現在的國家是中華民國，表明不主動的重建新國家(DPP1)。而後在李登輝的兩國論提出後，民進黨總統候選人陳水扁就表示贊同，並以「國與國的特殊關係」相對應(DPP2)。因此在兩岸是「兩個國家」而具有「特殊關係」上，國民黨和民進黨已經完全交合。在勝選後，由於希望緩和兩岸氣氛，陳水扁提出了可以把「一個中國」當作議題來討論的看法，這顯然是對於北京和美國壓力的反應，在發展方向上是又向右方移動了一步(DPP3)。但是由於議題說不是明確的立場，只是表示可以討論的空間，因此在圖三中 DPP3 是以虛線表示。⁴⁹

在中國大陸的方面，我們看到中共從最初的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解放台灣逐漸轉移到鄧小平在 1982 年首次提出的「一國兩制」(CCP1)。此後北京的對台基本態度就沒有變動，不過有時會透過汪道涵等透露出「一個中國並非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是中華民國」、「一個中國的分治」和「平等協商、共議統一」等彈性訊息。而在 1992 年「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也成為兩岸開啟交往的共識(CCP2)。然而中共較為緩和的言辭是針對台灣的，在所有的外交場合，北京的官式態度一直是三段式的一個中國論。因此中共表現出了「內外有別」的姿態。所以在圖三當中，CCP2 是用虛線表示。至於美國方面，從 1950 到 1970 年代初都是支持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而和北京沒有官

48. 吳玉山，「國民黨一個中國的主張形同破滅」，聯合報，台北，民意論壇，1999 年 7 月 11 日，版 15。

49. 在陳水扁總統 5 月 20 日的就職演說當中，對於「一個中國」的主張由「議題」變成了「未來的問題」，顯然沒有向中共所主張的一中作為「前提」更進一步。吳玉山，「五二〇從來不是危機，危機在後頭」，中國時報，台北，時論廣場，2000 年 5 月 21 日，版 15。

方關係。然而到了 1972 年「上海公報」之後，美國的立場實質上已經變成「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了(US1)。接下來的發展是美國在 1979 年和中共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而其官方立場也變成支持一個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不過由於堅持兩岸和平解決爭端，在實質上又以軍事手段協助防衛台灣，因此美國的立場其實是支持台灣作為一個次國家而獨立存在的政治實體(US2)。從這個圖形當中我們可以看出，在 1990 年代初，台灣、美國和中共的立場相當接近，都是在「一個中國」的區間。

從三方面對於兩岸定位的變動來看，很明顯是台灣的變動幅度最大，而這是反映了台灣內部的政治發展以及選票極大化策略模式的預期。由於選舉迫使台灣各黨在兩岸定位上趨於中間（某一種兩個中國的論述），因此在三方的全論述區域當中執政黨的立場其實是向左方移動，而和北京與華盛頓漸行漸遠的。也就是說，台灣內部在國家定位上的均衡點和國際上所能夠接受的台灣國家定位的均衡點（某一種一個中國的論述）有很大的差距。這個差距產生了很大的壓力，結果造成陳水扁在當選後，做出各種不改變現狀的保證，並且聲明在中共不動武的情形之下，他「保證在任期之內，不會宣佈獨立，不會更改國號，不會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會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投，也沒有廢除國統綱領與國統會的問題」。這個態度一方面是將台灣的國家定位工具化，作為嚇阻中共動武的手段，一方面也表現了陳水扁在其台灣獨立場上的讓步，事實上和美國所倡議的「中程協議」所主張的「台灣不獨，中共不武」互相符合。⁵⁰新總統的這個姿態，一方面有穩定國內政局的意義，更重要的則是對於國際局勢的妥協。

50.同註 49。

圖三 戰略三角各方兩岸定位的變動

在圖三當中我們看不出來美國在兩岸定位上有太大的變動，然而如果我們將國家定位外的其他變項考慮進去，會發現華盛頓作為一個非自願的樞紐，其中國政策也是受到國內選舉的影響，而有週期性的擺盪，已如前述。至於北京，雖然在政治體制上是共黨專制，而沒有多黨競爭的選舉壓力，但是它在對台政策上也受到國內政治的制約。那就是一方面必須守住基本的民族主義立場，以維繫政權的合法性；一方面又不能引爆戰爭，造成和美國與西方的全面決裂，而破壞了經濟改革的成果。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已經無法作為中共政權合法性基礎的情形之下，北京依靠的是民族主義和經濟表現，而這兩樣在對台灣的政策上是帶來相互衝突要求的。民族主義要求對台灣施壓、對台灣不惜一戰；而經濟表現要求一個穩定安全、和西方與台灣和平相處的環境。北京的對台政策，會在這兩種壓力和要求之下擺盪，究其實，也是充滿了國內政治的考慮。一般而言，在中共國內經濟狀況亟需和西方合作的情況下，經濟的考慮會增加，對台灣的壓力有限；而當經濟表現良好時，對台施壓的經濟成本就較低，而中共的民族主義勢力便容易抬頭（如圖四）。

經濟表現和民族主義可以決定中共政權的合法性，而中國共產黨內的權力鬥爭會決定個別領導人的政治命運。雖然沒有公開的選舉機制，但是中共五年舉行一次的全國代表大會仍然提供了對於現任領導人挑戰的機會。這可以視為民主體制下週期性選舉的「不完全功能替代物」。每當中共的現任領導人受到挑戰的時候，對外政策就必然會趨於強硬；而當現任領導人權力地位穩固的時候，對外政策才有讓步的空間。⁵¹ 這樣看起來，理性的中共領導人在黨代表大會舉行的前後會

51. Parris Chang, "Beijing's Policy Toward Taiwan: An Elite Conflict Model," in Tun-jen Cheng, Chi Huang, and Samuel S .G. Wu, eds., *Inherited Rivalry: Conflict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Boulder, Colorado: Lynne Rienner, 1995).

採取強硬的對台政策；而在兩次黨代表大會之間則較有可能對台灣採取較為溫和的策略。

圖四 國內政治影響戰略三角三邊行為示意圖

由於台灣、美國和中國大陸三方面的國內政治都對於其兩岸政策產生重大的影響，因此美國和兩岸之間相對政策距離就不斷變動。台灣的選舉使得總統候選人陳水扁向右移動，美國由於正處於總統大選前夕，因此其中國政策相當程度對台灣傾斜，這從華府對於中共「一

個中國的原則與台灣問題白皮書」的劇烈反應當中就可以清楚的看出來。在這種態勢下，華府和台北的立場較接近，而北京就承受了較大的壓力。由於中共的入關（北京稱復關）和永久最惠國待遇等問題在美國國會處於決定性的關鍵時刻，因此站在北京的立場，從李登輝特殊國與國關係論拋出後，其反應其實是相當克制的。這個因素也被江澤民權力地位仍然穩固而獲得增強。對於江澤民的權力挑戰會在兩年後才達到高峰，而台灣的總統選舉剛巧落於十五大和十六大的中間，也就是處於一段江澤民在對外政策上可以有較大自主空間，不必受到黨內強硬派掣肘或要脅的時期。也就因為在台灣總統選舉的時候，美國受到選舉週期的影響較為親台北，台灣各總統候選人和總統當選人的大陸政策中位化和溫和化以及中共的經濟考慮增加、對最高領導人的週期性挑戰又尚未出現，因此對台政策不致太過強硬，所以台海危機並沒有出現。

然而對於台灣而言，此一有利的三邊條件組合並不會持久。在台灣方面，當陳唐體制穩固後，民進黨所主導的政府不可避免的會再度向左移動，這是因為在選間期政府有較大的對外政策自主性。在此同時，美國的總統大選舉行過後新政府也將快速的擺脫國內選舉的壓力，從而採取較為親北京（向右傾斜）的現實主義中國政策。最後在中國大陸方面，一旦入關並且完全擺脫金融危機的陰影後，對於美國的抗壓性就會增加。而 2002 年十六大的權力鬥爭陰影又逐漸靠近，此時其對台政策便可能會向右方傾斜。於是北京與華盛頓擺向同一個方向，而台北和兩方的距離又大幅增加，則北京方面採用強制性作為的可能性便會增加。從這樣的分析當中我們可以看出，當三方都受到國內政治的壓力，而產生政策波動的時候，台灣的安全地位是時而有利、時而不利的。這個分析告訴我們，對於台灣而言，真正的危險不是在 2000 年 5 月，而是在 2001 年以後。屆時美國已經總統選舉完畢，新總統就職，現實主義開始掛帥，而華盛頓也開始親北京。台灣將在 2001 年年底舉行立法委員選舉，屆時國民黨必然會喪失若干席次，而

由於選舉制度不同，立院選舉傾向於激化、而非沖淡統獨爭議，於是台獨的聲勢可能高漲。最後中共的權力鬥爭隨著十六大的接近而趨於劇烈，對台政策也將會轉向強硬。站在台灣安全的立場來看，最大的挑戰並不是在政權轉移的過程當中，而是在美國、中共和台灣的三邊國內因素都趨向於引爆台海爭端的時候。

（收件：2000 年 5 月 25 日，審查：2000 年 6 月 15 日，採用：2000 年 7 月 7 日）

參考文獻

- Baldwin, David A., ed. 1993.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Carr, E. H. Carr. 1946.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New York: Harper & Row.
- Chang, Parris. 1995. "Beijing's Policy Toward Taiwan: An Elite Conflict Model." In Tun-jen Cheng, Chi Huang, and Samuel S.G. Wu, eds., *Inherited Rivalry: Conflict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Boulder, Colorado: Lynne Rienner.
- Cheng, Tun-jen, Chi Huang, and Samuel S.G. Wu, eds. 1995. *Inherited Rivalry*. Boulder, Colorado: Lynne Rienner.
- Dittmer, Lowell. 1981. "The Strategic Triangle: An Elementary Game-Theoretical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33(4): 485-516.
- Dittmer, Lowell. 1987. "The Strategic Triangle: A Critical Review." In Ilpyong J. Kim, ed., *The Strategic Triangle: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Paragon House Publisher.
- Downs, Anthony. 1957.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Row.
- Henderson, Gregory, Richard Ned Lebow, and John G. Stoessinger, eds. 1974. *Divided Nations in a Divided World*. New York: David McKay.
- Kissinger, Henry. 1994. *Diploma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Tonelson, Alan. 1991. "Prudence or Inertia? The Bush Administration's Foreign Policy." *Current History* 90(558): 311-316.
- Wu, Yu-shan. 1993. "The Collapse of the Bipolar System and Mainland China's Foreign Policy." *Issues and Studies* 29(7): 1-25.

- Wu, Yu-shan. 1994. "Mainland China's Economic Policy Toward Taiwan: Economic Needs or Unification Scheme." *Issues and Studies* 30(9): 29-49.
- Wu, Yu-shan. 1996. "Exploring Dual Triangles: The Development of Taipei-Washington-Beijing Relations." *Issues and Studies* 32(10): 26-52.
- Wu, Yu-shan. 1998. "Moving towards the Center: Taiwan's Public Opinion and Mainland Policy in Shif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kshop on Cross-Strait Relations,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Vancouver.
- Wu, Yu-shan. 1999. "Taiwanese Elections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Mainland Policy in Flux." *Asian Survey* 39(4): 565-587.
- 文畢真，2000，「徘徊在戰爭與和平的十字路口——台灣選舉後兩岸關係展望」，中國評論，4月號，頁5-8。
- 包宗和，1990，**台海兩岸互動的理論與政策面向：1950-1989**，台北：三民。
- 包宗和，1999，「戰略三角角色轉變與類型變化分析—以美國和台海兩岸三角互動為例」，載於包宗和、吳玉山主編，**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台北：五南。
- 包宗和、吳玉山主編，1999，**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台北：五南。
- 石之瑜，1999，「芝麻！開門 心理分析引領兩岸政策研究進入新境界」，載於包宗和、吳玉山主編，**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台北：五南。
-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1998，「中華民國台灣地區民眾對兩岸關係的看法—(1)」。
-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1998，「中華民國台灣地區民眾對兩岸關係的看法—(2)」。
- 冷則剛，1999，「大陸經貿政策的根源：國家與社會的互動」，載於

- 包宗和、吳玉山主編，**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台北：五南。
- 吳玉山，1993，「兩極體系的崩解與中共的外交政策」，載於江振昌主編，**國際新秩序的探索與中共**，臺北：政大國關中心。
- 吳玉山，1997，**抗衡或扞從：兩岸關係新詮—從前蘇聯看台灣與大陸間的關係**，台北：正中。
- 吳玉山，1999，「大陸政策，向中看齊」，**聯合報**，民意論壇，11月5日，第15版。
- 吳玉山，1999，「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載於包宗和、吳玉山主編，**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台北：五南。
- 吳玉山，1999，「台灣的大陸政策：結構與理性」，載於包宗和、吳玉山主編，**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台北：五南。
- 吳玉山，1999，「國民黨一個中國的主張形同破滅」，**聯合報**，民意論壇，7月11日，第15版。
- 吳玉山，1999，「明年總統大選，棄誰保誰」，**中國時報**，時論廣場，9月6日，第15版。
- 吳玉山，2000，「分裂的國民黨，送扁進總統府」，**中國時報**，時論廣場，3月19日，第15版。
- 吳玉山，2000，「五二〇從來不是危機，危機在後頭」，**中國時報**，時論廣場，5月24日，第15版。
- 吳新興，1995，**整合理論與兩岸關係之研究**，台北：五南。
- 李 怡，1998，「台灣的兩岸政策『三黨趨一』」，九十年代，339: 35-36。
- 明居正，1998，「向心競爭與中華民國政黨政治之發展」，**理論與政策**，12(2): 142-156。
- 林繼文、羅致政，1998，「零和或雙贏？兩岸經貿交流新解」，**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0(1): 33-77。
- 袁 易，1999，「安全典制與美『中』關係：一個認知社群論的分析架構」，載於包宗和、吳玉山主編，**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台

北：五南。

陳義彥、包宗和、張五岳、洪永泰、高安邦、游清鑫、劉義周、黃德福、吳玉山，1999，「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第四波面訪」，台北：陸委會研究計畫。

熊玠，1999，「二十一世紀中國統一前景預測」，中國評論，14: 60-64。

閻學通等，1997，中國崛起：國際環境評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羅致政，1995，「美國在台海兩岸互動所扮演的角色－結構平衡者」，美歐月刊，10(1): 37-54。

蘇格，1999，「世紀末國際形勢展望：國際格局與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中國評論，14: 8-10。

The Impact of Taiwan'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on Cross-Strait Relations: Vote-Maximizing Model and Strategic Triangle Approach

Yu-shan Wu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applies the "vote-maximizing model"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the ROC's 2000 presidential elections on cross-strait relations. Because public opinion features standard distribution on both unification-independence issue and security vs. economic interest issue, the mainland policy of the various political parties of Taiwan tend to converge toward the center. This tendency is embodied in Chen Shui-bian's "new middle road" and his willingness to discuss with mainland China on the issue of "one China" after he was elected president. Similar political pressure is put on American political parties concerning the US's China policy. During elections the US administration usually meet strong criticism from the Congress, the rank and file citizen. Since maximizing votes is the primary consideration of the incumbent party, there is always a tilt toward idealism and Taiwan. However, during the inter-electoral periods the US administration tilted back toward realism and take a pro-Beijing stance. In mainland China,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nationalism are the two remaining pilla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s legitimacy. The emphasis on the former results in pursuit of peace in the Taiwan Strait, while the stress on the latter tends to harden Beijing's stance toward Taiwan. The party congress held at five years' intervals pose challenge to the incumbents and induces them to take harsh policies toward Taiwa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s and their aftermath pose no real threat to Taiwan, as the combination of domestic factors in the three countries during this period of time is conducive to peace and security in the Taiwan Straits. However, 2001 and 2002 bodes ill to Taiwan, as the combination of domestic factors then will move to Taiwan's disadvantage.

